

《哥萨克》的叙事空间

杨明明

内容摘要：作为列夫·托尔斯泰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中篇小说《哥萨克》在其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小说藉由主人公奥列宁厌倦上流社会的生活，逃离莫斯科来到高加索这一线性叙事路径，完成了对莫斯科与高加索两大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与书写；同时，小说以空间体验作为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从中折射出作家的思想演变与精神探索轨迹，也凸显了小说深刻的哲学意蕴与独特的美学内涵。

关键词：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高加索；空间；叙事

作者简介：杨明明，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本文得到 2013 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

Title: The Narrative Space of *The Cossacks*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Russian writer Leo Tolstoy's early time creation, *The Cossacks* is a landmark in his writing career. The novella completes its constru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two big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s of Moscow and Caucasus by adopting Olenin's—the protagonist of *The Cossacks*—boredom of high society life and his escape from Moscow to Caucasus as its narrative path.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la takes spatial experience as an inner form of existential experience to reflect the path of Tolstoy's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spiritual exploration, as well as to highlight it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and unique aesthetic connotation.

Key words: Leo Tolstoy; *The Cossacks*; Caucasus; space; narrative

Author: Yang Mingm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Email: yangmm06@sina.com

《哥萨克》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有小说中较少受到关注的一部。小说通过描写贵族青年奥列宁厌倦上流社会的空虚与伪善，从莫斯科来到高加索服役以及此后驻扎在哥萨克村庄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托尔斯泰驾驭时间与空间的非凡叙事功力，在其创作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这部中篇小说的创作始于 1852 年，此后其写作时断时续，前后持续十年，基本贯穿了托尔斯泰早期创作的始终。按照最初构思，作家打算创作一部名为《哥萨克小说》的长篇小说，由“逃亡者”、“逃亡的哥萨克”和“哥萨克”三部分组成。1863 年，《哥萨克》正式发表于《俄国信使》杂志，这标志着托尔斯泰终于克服了“五十年代末所遭遇的思想和艺术危机”。^①此前，小说“家庭的幸福”所带来的挫败感曾让托尔斯泰疏离文学达四年之间，虽然期间也创作了“十二月党人”、“波利库什卡”、“霍尔斯托美尔”

以及反映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但却没有发表一篇作品。《哥萨克》历经十年磨砺，终于与读者见面，意味着托尔斯泰的回归与“重生”，^②重新找回“以心灵的全部力量来写作的作家”（Толстой 61: 24）的自信，标志着其创作由此步入一个成熟时期。紧随其后，作家便开始了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帝国空间”的建构。

20 世纪下半叶，由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及福柯、克朗等的文化地理学所引发的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为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阈。空间叙事理论的兴起始于弗兰克的论文“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此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佐伦的“走向叙事空间理论”等论著都对空间叙事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所谓“空间叙事”，是指文本中的空间不再仅仅充当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景，而是作为叙事技巧和手段参与和影响叙事，发挥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推动情节发展、升华作品主题等多项重要叙事功能。以往人们在研究小说叙事时，常常是重视时间而轻视空间，倾向于将空间视为一种自然的场景、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空间叙事理论将文学空间视为一个复杂的隐喻系统和语义系统，关注其历史文化、民族身份以及国家权力等意识形态表达，从而赋予了空间以较强的社会历史意义与道德文化意义。本文将依托空间叙事理论从地志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等多个层面对《哥萨克》进行解读和诠释。

较早关注到托尔斯泰小说空间性问题是巴赫金，他在“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中以基于“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一主体性诉求所提出的“时空体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巴赫金 274）。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出现“性格刻画对情节的替代，缓慢的速率，事件结局的欠缺，甚至是重复”（弗兰克 141），以及地域空间和自然环境对人物性格、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乃至社会关系产生影响等带有“空间形式”表征的标记。其小说文本中的空间也不再是“被动的、静止的或空洞的”，而成为“积极的、能动的、充实的”；不再是“事件在时间中展现时的背景或地点”（费伦 拉比诺维茨 209-210），而成为决定叙事发展的内在力量。

—

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地志空间”的概念，作为实体空间，它是由一系列对立的空間概念（如内与外、城市与乡村等）构成的。小说《哥萨克》借助主人公奥列宁从莫斯科到高加索、从城市到乡村、从都城到外省、从中心到边缘的位移，通过直接描写、叙述、对话、诗化文本等方式完成了地志空间的再现。作家通过对作为地志空间的莫斯科和高加索的对比，揭示了二者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其中所隐含的社会空间差距，起到了烘托氛围、刻画人物性格、深化主题、推进叙事的作用。

托尔斯泰赋予了莫斯科与高加索以深刻的象征意义。小说中作为城市空间的莫斯科既是一座“华丽的城”，也是一座“贫穷的城”，其“浮华的外表下”有的只是一颗“被缚的灵魂”，只有“苦闷、寒冷和岩石”（Пушкин 226）。小说《哥萨克》的开头这样写道：“莫斯科万籁俱寂。冬天的街上难得听到辘辘的车声。窗子里已没有灯光，街灯也熄灭了。但教堂里却传出当当的钟声，钟声荡漾在沉睡的城市上空，报道着黎明的降临”（托尔斯泰 157）。^③作家让主人公在“万籁俱寂”、“周围黑暗、寂静而凄凉”（161）的黎明时分离开莫斯科，充满象征意义。黎明是白日与黑夜的交替时刻，夜的寂静与黑暗象征着死亡，而教堂的钟声则象征着主人公走向救赎与新生。在莫斯科有的只是逢场作戏的爱情、口是心非的友谊、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掷千金的豪赌和趋炎附势的社交，奥列宁渴望“开

始一种新的生活”(159),“一种充满劳动、困苦和忙碌的生活”,一种“不会再犯错误,不会再有悔恨,只有幸福”(160)的生活。“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心里洋溢着青春的快乐”。逃离了都市的奥列宁,“环顾白雪皑皑的田野”,开始“感到单独处身在这自然环境中的情趣”(166)。在此,“白雪皑皑的田野”成为了小说中城市与乡村这两个空间的分野,主人公由此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体验。

巴赫金认为奥列宁具有典型的卢梭小说主人公的特征。一个内在性的、“个人生活”处于孤立隔绝中的人,渴望通过回归大自然、融入普通人的生活来医治自己的心灵创伤,“向普通人学习对待生与死的明智态度”;或是向往逃离文明,融入到“原始集体”(巴赫金431)的生活中去。托尔斯泰早年深受卢梭主义的影响,巴赫金的这一论断无疑对研究《哥萨克》的叙事问题具有较强的启示性。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主人公亦如作家本人,常常会选择离开都城圣彼得堡或莫斯科,回到自己的庄园或是转往俄国某个偏远的省份。这种从城市到乡村、带有象征意味的出走实际上亦是从道德沦落走向“自我发现和自我救赎”(斯坦纳77)的精神旅程。在此,作家常常使用隐喻和意象,将乡村和城市这两个空间联系在一起并加以比照。在托尔斯泰看来,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根本区别,体现了“非自然和不人道的城市生活准则与田园生活的黄金时代之间”的区别。作家的这种二元伦理观是构成其小说“双重或三重结构”(斯坦纳74)的主要动因之一。托尔斯泰从“道德和审美”这两个层面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形式”进行了审视。城市生活带来了“社会不公”、两性行为失范等诸多问题,使人逐渐丧失了生命力;而乡村的田园风光“充满生气,让人身心和谐”,“乡村生活的本能构成了存在的链条”,而两性行为则成为“神圣的、创造性的”(斯坦纳76)。作家让主人公在道德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哥萨克》便是最早的尝试之一。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文学空间作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其“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谢纳28-29)。托尔斯泰对于乡村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对于都市却有着莫名的隔膜感和距离感,他痛苦地意识到古老的莫斯科的生命力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蚕食殆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上流社会的虚伪堕落、人与人之间的自私冷漠引发了他对俄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忧虑与思考。托尔斯泰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并未仅仅局限于卢梭式的、对城市文明的批判与对回归自然的倡导,而是通过对高加索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并将哥萨克这一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现象嵌套于该空间中,从而赋予了小说以更加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独特的审美意蕴。

二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作为一个深深植根于历史的概念,它结底是“社会的和文化的空间”(陆扬67)。根据他的社会空间理论,如果说尚未被俄国军事征服和殖民之前的高加索作为一片本真的化外之地尚属绝对空间(或自然空间),那么此后它开始逐渐生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

沙皇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始于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此后,沙俄军队对山民进行了长期的残酷镇压,直至通过1817—1864年的高加索战争才最终将高加索完全并入版图。自19世纪三十年代起,高加索问题在俄国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日趋尖锐,俄国作

家并开始尝试将其纳入到“俄国—西方—东方”这一类型学三角之中。从文化的类型学特征角度来看,“俄国文化的特点在于其既与西方对立,又与东方对立。俄国在这一类型学意义上就获得了北方的称谓,并与前两种文化类型构成了复杂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它与二者对立,另一方面,对东方来说它是西方,对西方来说它又是东方”(Лотман 606)。如果说莱蒙托夫最早在《当代英雄》中将主人公毕巧林置于由“西方(波兰)—东方(高加索)—人民的俄国”构成的文化空间之中,那么托尔斯泰在《哥萨克》中不仅延续与深化了这一思考,还完成了“西方(欧化的俄国上流社会)—东方(高加索)—俄国(哥萨克)”这一“托尔斯泰式的”文化空间的建构。小说藉由主人公奥列宁逃离莫斯科、来到高加索并随部队驻扎于哥萨克村庄这一线性叙事路径将该三元结构逐步建构起来。

在18世纪的俄国诗歌中,高加索开始被赋予某种“神秘的异域风情”色彩。在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高加索一直充当着东方的载体,并最终成为重要的“民族文化代码”之一。19世纪俄国文学对高加索主题的多元化思考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其形成与演变更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自普希金开始,“高加索的艺术形象”发生了本质变化,“高加索社会”开始被区分为多个“行使自己法则”、“不同于欧洲文明”又彼此各不相同的“文化层”。^④此后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们更是赋予了这一主题以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托尔斯泰来说,高加索主题贯穿于其创作始终,从早期的“袭击”(1853)、“伐木”(1855)、《哥萨克》到成熟期的《高加索俘虏》(1872)再到后期的《哈吉—穆拉特》(1896-1904)即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究其原因,诚如作家所说的,“这里如此奇怪又如此诗意地混合了战争与自由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东西”(Толстой 47: 10);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缘自作家对道德自我完善与人生终极价值孜孜不倦的追求。

小说中的高加索作为莫斯科的对立物,是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一个让主人公憧憬着返璞归真的理想家园。这一空间的缔造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内涵,更与作家对不同空间的生存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旅途中的奥列宁对高加索曾经充满了乌托邦式的想象,“阿玛拉特老爷、契尔克斯女人、崇山峻岭、可怕的激流和种种危险”,“这些遐想”虽然“都是朦朦胧胧的”,但“荣誉的诱惑和死亡的威胁却使未来更加迷人”(168-69)。但是,当他亲身领略高加索的壮丽景色,被“这无与伦比的美景”(171)所深深震撼与折服之时,“他所看见的,他所想到的,他所感觉的,都离不开那对他十分新鲜而又异常庄严的群山。关于莫斯科的一切回忆、羞耻和悔恨,关于高加索的种种庸俗的梦想,全消失了,一去不返了”(174)。“原来从这儿开始”(171)、“这下子可开始了”(174)等语句更是标志着小说在此彻底完成了空间的动态转换与衔接,在此后的情节发展中,高加索不再仅仅充当一般意义上的叙事背景,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凸显出来。

俄国浪漫主义作家赋予了高加索以东方属性,他们基于这一理念所绘制出的“高加索图景”此后也深深植根于俄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当中,以至于每位描写高加索的作家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停留在他们所熟识和期待的特征上,如山峦、峡谷、天空和乌云等这些被标记了东方属性的元素。在《哥萨克》这部小说中,对高加索的整体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这一浪漫主义的“高加索图景”,作家通过深受浪漫主义熏陶的俄国“文明人”奥列宁的视角将上述东方元素一一呈现了出来;但是,托尔斯泰并没有因袭“疯狂的勇士”加上“生活在蔑视与复仇情感中的阴郁的拜伦式人物”(Эйхенбаум 92)这一浪漫主义旧套,让一直作为高加索东方性符号出现的切尔克斯人等原住民族直接充当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而是选择了混合俄罗斯与东方文化特征的高地哥萨克取而代之,并以此来承载

作家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及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与阐释。

三

人是空间的细胞,又是空间的灵魂,正是人的存在赋予了空间以意义与价值。《哥萨克》的空间叙事的独特之处在于作家不仅描摹客观的空间环境,还赋予空间以人的灵性,使空间成为小说叙事中的鲜活角色,更在空间中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作为擅长运用“空间表征法”的作家,托尔斯泰在小说中通过对高加索空间的书写完成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塑造。

哥萨克作为俄罗斯民族内部一个具有独特历史与文化的地方性人群共同体,在历史上一直以追求自由、英勇善战著。其“自由、平等、全民皆兵”的生活方式甚至曾令托尔斯泰一度将其视为“俄国的未来”(Толстой 47: 204)。居住在捷列克河畔的高地哥萨克作为哥萨克的一支,在“保持着纯粹的俄罗斯语言和旧教信仰”的同时,逐渐接受了当地“山民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跟车臣人通婚、穿契尔克斯人的服装,青年之间甚至用鞑靼话互相开玩笑。“爱好自由、游荡、劫掠和战斗”是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他们“自以为具有高度的文明”,“认为只有哥萨克才是真正的人,而瞧不起其余的一切人”(176)。奥列宁随部队驻扎的诺伏姆林村正是“高地哥萨克的发源地”,“这个村庄比其他村庄保持着更多高地哥萨克的古老风俗”(177)。“在这儿,他作为一个新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身体越发健康”,“心情也很舒畅”,“尝到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青春的生活乐趣”(210)。在这里,他结识了耶罗施卡大叔、鲁卡沙等哥萨克,甚至还爱上了房东的女儿——美丽的哥萨克姑娘玛丽雅娜。

诺伏姆林村是高地哥萨克生活的缩影,作为高加索文化子空间之一,其建构是与马、军刀、步枪、门、房子等作为空间要素的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马、军刀、步枪象征着哥萨克的尚武精神,那么门与房子则更多地与奥列宁发生关联。门意味着一个新的空间的开启,更具有“复活、更新、彻悟”、做出某些人生决定等“隐喻意义”(巴赫金 450)。而房子作为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空间意象,则是与家、庇护所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家是人类“最初的宇宙”(巴什拉 3)、“最早的世界”,作为“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巴什拉 5)。一个人失去了家,也“就成了游离失所的存在”(巴什拉 6)。在诺伏姆林村这一空间场景中以“外来者”形象出现的奥列宁,虽然陶醉于乡村田园的美丽风光,对当地人的边缘化生存方式心驰神往,并且努力尝试去像哥萨克一样生活,穿切尔克斯人的衣服,学说鞑靼话,同耶罗施卡大叔交朋友,一起喝酒打猎。但是,作为一个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漂泊者,即便逃离了城市,他也依然无法真正割断与上流社会和城市生活的联系,这一点表现在他对待自己的“一个莫斯科的熟人”(272)别列茨基的态度上。对于后者的到来,令“奥列宁最恼恨的是,他不能(说什么也不能)断然拒绝这个从旧世界来的人,仿佛旧世界对他具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他生别列茨基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但也不由自主地在谈话中夹杂法语,并且对总司令和莫斯科的熟人发生兴趣。又因为在哥萨克村子里只有他们两人讲法国话,他有点蔑视别的军官同事和哥萨克,而对别列茨基表示友好”(273)。事实上,他是无法真正融入哥萨克生活的,更多时候表现出的是一种疏远多于亲近、中立多于介入的旁观者姿态。这一切,对他来说不过“像一个迷人的梦”(252)而已。他想“做一个普通的哥萨克,接近大自然”,却总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意识在阻止他”(289)。

四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中存在着一一种将世界划分为善、恶和日常生活的三元模式，其中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人自然存在的世界，无关乎善恶、天才还是罪恶、道德高尚还是卑劣，仅仅“以存在为特征”（Лотман 598）。这一发端于普希金、终结于契诃夫的模式，充分显现于托尔斯泰的创作中。他笔下的人物有处于善恶之间、在由恶向善的道路上执着探索型，有自我发展和自我评价型，还有毋须加以评价的存在型。小说中耶罗施卡大叔即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其世界是诗意的，是“处于道德评价之外”的，仅仅由“生活本身”和“自身的存在”（Лотман 598）来证明。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上述三元模式是由两个二元模式交叉构成的。首先是，自然的生活（美好的、合理的、和谐的、自然所固有的）与反自然的生活（否定的、人所创造的）对照。其次是，人造世界又分为停留于反自然性中的世界与否定自我、获得了高度道德价值的世界（Лотман 600-601）。作家借助于这一独特的三元模式描写了真实的现实。这一模式实际上体现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存在从本质上就是道德的，而恶则是对存在本质的偏离”（Лотман 598）。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作家还赋予了这一模式以卢梭主义色彩，从而使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民族性。追根溯源，这一心理结构实际上源自“反映物质现实的民间多神教观念和生活的世界与普遍的基督教二元性的叠合”（Лотман 599）。在《哥萨克》中，这种民间观念即体现在耶罗施卡大叔与奥列宁的一段谈话当中：“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给人享受的。什么罪孽也没有。就拿野兽来做比方吧，它可以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过活，也可以在我们的芦苇丛里过活。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上帝给你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们那里的人说，贪吃要到地狱里去舔烧红的锅子的”，“这些全都是神父们骗人的鬼话”，“人一死，坟上长出青草来，这就完了”（230）。这段话带给了奥列宁的心灵以巨大的冲击，引发了其对生命的终极思考，直至鹿这一客观对应物的出现，最终促成了其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在一次与耶罗施卡大叔的狩猎中，奥列宁与一只鹿相遇。听到鹿的蹄声，他“觉得心里好像有样东西断裂了”（254）。第二天，他又独自去树林中寻找那只鹿，却没有找到，躺在遇到那只鹿的地方，他“恍然大悟，他根本不是什么俄罗斯贵族，不是莫斯科社交场中的人物，也不是某某人和某某人的亲戚朋友，他只是一只蚊子，一只野鸡，一只鹿，跟此刻生活在他周围的那些东西一模一样”。他意识到自己“也会像他们那样，像耶罗施卡大叔那样，活一些时候，然后死去”，“只有青草在上面长出来”（256）。奥列宁这个姓氏实际上即源自俄语中的鹿（олень）一词，在小说中，鹿既是大自然的化身，又象征着奥列宁迷失的自我。

托尔斯泰力求“从一切表面现象返回到现实”，“从本原上去观察现实，通过内心行为去把握现实”（雅斯贝斯 3）。《哥萨克》体现了 19 世纪人们渴望生活、渴望体验的精神诉求，他们“追求‘本真’，寻找‘本原’，企求成为真正的人”，即使“在最卑微的人身上”，“也能发现真实的和存在着的東西”（雅斯贝斯 3-4）。事实上，作为作家和作为一个人的托尔斯泰自始至终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不断直面生活”，因为真理本身就是“不断直面生活”（巴雷特 140）。他所追求的真理不只是藉由理智获得，更是要靠整个生命来获得。他的这种真理观体现于其创作中，即表现为在其全景式小说中，总有那么一个人物作为“托尔斯泰的使者”、“精神的旗手”出现，不断去“寻求他自己的真理以及生命本身的真理”（巴雷特 141），奥列宁便是其中之一。小说中奥列宁也正是

从哥萨克身上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像大自然一样生活：死亡，诞生，结合，又是诞生，斗争，吃，喝，欢乐，又是死亡，除了大自然赋予太阳、青草、野兽和树木的那些条件之外，就没有别的条件了”，更加“没有别的规律”可言。相较于奥列宁，耶罗施卡大叔和玛丽雅娜“美丽、强壮、自由”（289），是“像大自然一样稳重、安详、自在”（317）的存在，这也就是在小说中扮演着“浪漫主义长者”角色的耶罗施卡大叔之所以能够充当奥列宁的人生导师，玛丽雅娜对奥列宁来讲在精神上是高不可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哥萨克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名为《哥萨克》也就缘起于此。

19世纪俄国独特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语境，人性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几乎成为所有优秀作家的共同艺术诉求。自普希金开始，“人对全面和谐发展的渴望”（Бурцов 261）与其所处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就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恒常精神母题，自此，“努力追求和谐发展却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理想的人”也就成为了一部又一部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在俄国作家中，再也没有人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全面而深刻地揭示19世纪的人的这种崇高志向”（Бурцов 262），并以自己的全部创作对这一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程以及与之相伴的人的悲剧性进行整体性与全景式描绘，其笔下的主人公也正是由此获得了普遍性意义。

俄国文学自普希金起，就开始尝试表现人是有摆脱悲剧性出路的。托尔斯泰将人的悲剧与出路分别视为“人的精神特质与存在的物质条件”（Бурцов 262），并在创作中将两者独特而巧妙地合二为一。以奥列宁为代表的一系列主人公“沉浸于自我、沉浸于自身涵盖了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有时对于某一历史时段来说并不典型，但却总是带有精神在整个19世纪悲剧性却又不失希望的探索的特征”。这样的主人公“只能产生在接受了西方思想与文化成就的俄国”，也只能产生于“托尔斯泰时代”。他们“从来都不满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Бурцов 262），不断地寻求着更好的出路，不断地改变着自己，其“精神与道德探索及其自我完善的努力”是与“对不断变化中的19世纪人的心理及其产生条件的批判性分析联系在一起的”。主人公的这种自我批评实际上是“对文明的批判”、“对文明的反人性特点的批判”，这就必然会“导致宗法制幻想”，而这种宗法制幻想在破灭后，又会被“新的幻想所取代”（Бурцов 263）。所以，在《哥萨克》的结尾，奥列宁只好选择了再次离开，如同小说的开头一样，从一个已知空间向下一个未知空间辗转。

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没有执着于时间流淌的表象，而是“在文学空间的体验中沉入生存的渊薮之中，展示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在他的小说中，文学空间不再仅仅具备“单纯的物理空间场所再现和心理空间意识表现的功能”，而成为直抵人的“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小说《哥萨克》以“空间体验”作为“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谢纳 29），展现了作家缔造空间和驾驭叙事的非凡功力，其对生命的深度诠释、对永恒救赎的不懈追求，值得我们深思与回味。

注解【Notes】

① ② Л. Д. Опуль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Л. Н. Толстого «Казак»”, Л. Н. Толстой, *Казак*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7) 341.

③ 参见列夫·托尔斯泰：《哥萨克》，草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引用只标注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④ Л. Чакветадзе, “Концепт «Кавказец»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А. Казбеги «Отцеубийца» и Л. Толстого «Хаджи-Мурат», *Уральский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4 (2012): 239-40.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巴什拉：《空间诗学》，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Bachelard, Gaston.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 Zhang Yij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Bakhtin, Mikhail. *The Complete Works of Bakhtin*. Vol. 3. Trans. Bai Chunren et al.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8.]

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杨照明 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Barrett, William. *Irrational Man*. Trans. Yang Zhaoming and Ai P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Бурсов, Б. И. *Избранные работы*. Т. 1.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82.

[Bursov, B. I. *Selected Writings*. Vol. 1. Leningrad: Literature, 1982.]

Эйхенбаум, Б.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87.

[Eichenbaum, Boris. *On Literature*. Moscow: Soviet Writer Press, 1987.]

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秦芳林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Frank, Joseph.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e*. Trans. Qin Fanglin. Beijing: Peking UP, 1991.]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Jaspers, Karl. *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 Trans. Wang Jiux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3.]

Лотман, Ю. М.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1997.

[Lotman, Y. M. *On Russian Literature*. Saint-Petersburg: Art-SPb, 1997.]

陆扬：“空间转向中的文学批评”，《吉林大学学报》5 (2009): 66-72。

[Lu Yang, “Spatial Change of Literary Criticism.”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5 (2009): 66-72.]

费伦 拉比诺维茨：《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Phelan, James, and Peter J. Rabinowitz.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Trans. Shen Dan et al. Beijing: Peking UP, 2007.]

Пушкин, А. С.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0 томах*. Т. 2. 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9.

[Pushkin, Alexander. *Collected Works in 10 Vols*. Vol. 2. Moscow: Literature Press, 1959.]

斯坦纳：《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严忠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Steiner, George. *Tolstoy or Dostoevsky*. Trans. Yan Zhongzhi. Hangzhou: Zhejiang UP, 2011.]

Толстой, Л. 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47, 61. М.: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37, 1953.

[Tolstoy, Leo. *The Complete Works of Leo Tolstoy*. Vols. 47 and 61. Moscow: Nation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37, 1953.]

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Xie Na.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Literatur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Turn*.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10.]

责任编辑：王树福